

巴迪欧论爱与艺术在世界的“相遇”

——一种基于新唯物主义诗学的解读

谭 成

摘要:巴迪欧关于爱的理论包含着一个新唯物主义的诗学论题:从偶然性范畴出发思考爱与艺术的关系,以及考察两者在世界的“相遇”所具备的真实效应。这个论题的展开涉及对巴迪欧相关论述的整理和阐释,分为三个部分:一是阐明巴迪欧“爱是两的场景”命题的内涵,揭示其新唯物主义哲学的特征;二是明确艺术应该致力于发掘“爱的延续”的主题,从而生产出关于新世界的经验;三是强调在重建世界的目标上,爱与艺术能够借助“相遇”的力量结成“同盟”并介入政治实践。由于巴迪欧推进了浪漫主义通过爱与艺术的创造来弥合现代世界之分裂的构想,继承了阿尔都塞的“偶然唯物主义”将与事物“相遇”作为主体行动的基本立场,使得其愈发模糊艺术与政治的界限,从而在反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构想上呈现出浪漫化色彩。这正是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理论具有一种诗学上的吸引力,但其政治方案却饱受诟病的原因。

关键词:巴迪欧; 新唯物主义; 偶然性; 爱; 艺术; 相遇

作者简介:谭成,文学博士,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美学研究。通信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19号,400067。电子邮箱:tancheng2022@foxmail.com。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西方新唯物主义诗学及其批判研究”[项目编号:22BZW195]、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新唯物主义诗学理论谱系研究”[项目编号:21SKGH103]阶段性成果。

Title: Alain Badiou on the Encounter of Love and Art: A New Materialist Poetic Perspective

Abstract: Alain Badiou's theory of love encompasses a topic on new materialist poetics, which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ve and art in the realm of contingency as well as explores the real effects of their “encounter” in the world. This analytical journey necessitates a detailed interpretation of Badiou's pertinent discussions, structured into three pivotal segments. Firstly, it clarifies the connotation of Badiou's proposition that “love is the scene of Two,” positioning this assertion within the broader spectrum of new materialist philosophy. Secondly, it delineates the imperative for art to delve into “the continuation of love”, thereby fostering experiences emblematic of a new world. Thirdly, it stresses that in reconstructing the world, love and art can form an “alliance” by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encounters.” This perspective is enriched by an engagement with Althusser's concept of “aleatory materialism,” advocating for a Romantic project aimed at ameliorating the fissures with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rough the creative interplay of love and art. This blurs boundaries between art and politics, resulting in a romanticized orientation within his political proposals against global capitalism. Such an orientation exemplifies the poetic allure inherent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radical leftist theory, notwithstanding the contentious reception of its political propositions.

Keywords: Alain Badiou; new materialism; contingency; love; art; encounter

Author: Tan Cheng, Ph.D.,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er in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with research interest in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Address: 19 Xuefu Avenue, Nan'an District, Chongqing 400067, China. Email: tancheng2022@foxmail.com.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General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 (22BZW195) and the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s Project of Chongqing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21SKGH103).

在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的哲学体系中,爱与艺术是两种不同的真理生产程序,也是哲学话语生产的主体性条件(Badiou, *Conditions* 79)。哲学家试图从对爱的思索中获得某种普遍真理,艺术家则期望从爱的经验中捕获创作的灵感。爱常常成为他们共同关注的对象。但哲学家与艺术家的立场毕竟不同,他们对爱的本质的思考也难以达成一致。这在柏拉图的《会饮》(*The Symposium*)中有详尽的描写。诗人阿里斯托芬与哲人苏格拉底各自就爱欲的问题发言,但立场迥异,无法沟通,而作为纯粹爱欲象征的阿尔喀比亚德突然“闯入”,以一番惊世骇俗的发言彻底激化了诗人、哲人和爱人三者为爱欲问题上的分歧。巴迪欧认为能够出面调停分歧的是哲学,因为哲学的概念生产可以为爱与艺术的真理共存制造空间。更重要的是,哲学的调停能使哲学家、艺术家和爱人达成奇妙的协作关系,从而促成各种主体性力量的集结,并最终指向对世界的实践。巴迪欧的工作实际上开启了一个新的诗学论题,即如何从偶然性范畴出发思考爱与艺术的关系,以及两者在世界的“相遇”会带来何种效应。为了深入展开这个论题,本文将从巴迪欧对爱的哲学沉思开始,阐明“爱是两的场景”的命题内涵及其背后的新唯物主义思维特征;然后考察艺术如何处理爱的“相遇”与“延续”主题,借此表明艺术在爱的延续性经验的创造上,与一个新世界的内在性生成紧密相关;最后论述爱与艺术在重建世界问题上结成的“新唯物主义同盟”。巴迪欧推进了自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以来浪漫主义者对爱与艺术的关系构想;通过爱与艺术的创造来弥合现代世界的分裂。不过他的姿态更为激进:重建世界的可能性取决于,爱与艺术的主体能否理解并掌握“偶然性”的力量。

一、哲学的追问:爱是什么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个观点:巴迪欧对爱的本质的沉思具有新唯物主义哲学思维的一般性特征——不是从必然性范畴,而是从偶然性范畴出发去探寻真理的普遍性问题。在他的论述中,爱作为一种真理生产程序,始于偶然事件,却能抵达普遍观念,驻足于永恒的时间,这本身就是不寻常的,其细节过程值得探究。但将偶然性范畴置于

哲学思考的中心并非巴迪欧的首创,而是始于他的老师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关于“偶然唯物主义”(aleatory materialism)的研究构想(《论偶然唯物主义》116)。这是一种与旧唯物主义传统有极大差异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巴迪欧指出,阿尔都塞晚年曾意识到唯物主义需要一个包含偶然性学说的本体论,却没有时间去完成,而他自己则在这个方向继续前行(“Can Change Be Thought?” 30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以事件概念为主线撰写了大量的哲学著作,不仅以偶然性范畴为中心,而且在理论的体系化程度上远远超出了阿尔都塞的设想。所以当我们讨论巴迪欧的爱理论时,就不得不留意在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新唯物主义思维。

巴迪欧对爱的本质的追问开始于这样一个问题:“爱是什么?”他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采用数学的公理化方法,其理由是讨论爱的主题更需要纯粹的逻辑,如此才能确保人们不是从固有的观念出发(比如总是将爱与激情、过失、嫉妒、性和死亡等惯常主题联系起来),而是从对象本身出发追问其存在的本质。他提出了四个基本论点:1. 有两种经验立场;2. 两种立场是完全分离的;3. 没有第三种立场;4. 仅有一种人性(*Conditions* 257—258)。四个论点看起来非常抽象,但相互之间却有着严密的逻辑连贯性,共同构成了对“爱是什么”的回答。

第一个论点:有两种爱的经验立场。这是说在爱的情景中,有两种经历爱的性别立场,一方被叫作女人,另一方被叫作男人。这一论点来自对日常爱情事件的直观,通过抓住其中的数字性,得出了爱的最小条件:爱不是“一”,而是“两”。如果说“二”可以被计数(比如“一加一为二”),那么“两”则在计数法则之外,指涉的是“差异”的共存。因此男人与女人所代表的性别立场,并不是依据生理学或心理学的划分,而是依据思辨逻辑对差异性立场的命名。由此,我们获得一个关于爱的本体论公设:爱起源于差异。

第二个论点:两种立场是完全分离的。这里的“完全”是指男人与女人的经验立场没有任何共通之处,是绝对的分离。男人与女人永远不会拥有对方的经验,双方也不会获得性别“分离”的知识。基于性别的经验立场具有绝对的差异性,这是对第一个论点的进一步规定。通常情况下,

要获得“分离”或“差异”本身的系统化知识,需要一个能够完整审视分离双方的第三立场,即一个洞观全局的旁观者,才能同时分享男人与女人的经验。然而,这一立场并不存在。

于是有第三个论点:没有第三种立场。如果有第三种立场,那只能是一种天使立场。天使是无性别的,或者说是超性别的,从天使的视角可以观察并宣布男性与女性的分离。然而天使毕竟是超验的,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如何不从天使视角(一个结构性的第三立场)来实现对分离的两性立场的认知?答案是从“事件”出发——“事件作为爱的进程的开端,我们可以称之为相遇”(Badiou, *Conditions* 258)。第三个论点的中心意义由此凸显出来。如果说爱起源于性别差异,而差异又是绝对的,那么两性立场就不会有任何交集,就不会有爱的发生。但在我们的世界,爱的确是存在的。那么这其中一定有某种东西打破了僵局。这就是巴迪欧所说的“事件”,通常出现在男女邂逅的爱情时刻。爱的相遇会带来全新的认知后果——一种能包容绝对性差异的普遍性视角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就有第四个论点:仅有一种人性。这里的“人性”概念没有任何人本主义的内涵,而是指涉一种“功能”,用于承载真理程序及其主体的历史呈现:

我所说的“人性”是指为普泛或真理程序提供支撑的东西。这类程序有四种类型:科学、政治、艺术,确切地说,还有爱。只有当(解放的)政治、(概念性的)科学、(创造性的)艺术和爱(不能简化为感官和性的混合)存在时,人性才能得到证明。人性维系着这些类型中的诸真理的无限奇异性。人性是诸真理的历史性的身体。(*Conditions* 258—259)

巴迪欧的人性概念和真理概念是紧密相连的。人性作为一种功能性实在使人能够作为主体参与诸真理的生产,而诸真理的存在又反过来证实人性的存在。简而言之,人性就是人类通过参与真理的生产而成为主体的一种能力。由此,论点“仅有一种人性”的意涵也就明确了:人性是唯一的,不会因历史时期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人性

使每一个体都具备参与真理生产的相同能力,那么真理本身就能够超越所有立场而具有普遍性。

论述至此,似乎还面临一个问题:“仅有一种人性”的论点如何与前三个论点保持逻辑的连贯性?前三个论点强调了存在两个绝对分离的经验立场,按照这一设定,从分离的立场中产生的真理依然是“分离”的,即真理是性别化的,比如有男性的科学、艺术、政治与爱欲,也有女性的科学、艺术、政治、爱欲。显然这一推理与第四个论点的意涵——强调真理的“超立场性”,即真理对所有入都是相同的——是相悖的。针对这个问题,巴迪欧定义了爱作为一种真理生产程序的独特价值:“爱正是解决这一悖论的场所。让我们来仔细考量这个说法。首先,这意味着爱是一种围绕悖论的运作。爱不能消除悖论,它处理悖论。更准确地说,它使悖论本身成为真理。”(*Conditions* 260—261)他相信爱作为一种运转过程,能够生产出容纳“分离立场”的真理,即能够包容绝对差异的普遍真理。

上述四个论点是巴迪欧为思考“爱是什么”所确立的“公设”,借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会说爱就是这样:两(Deux)自身的来临,两的场景。”(*Conditions* 263)在这里,我们没有将“Deux”翻译为“二”,而是“两”,是因为要脱离计数的规则,即不能将“两”还原到1、2、3……n的自然数序中。实际上,爱之中的“两”是对能够容纳“差异”(不是消融差异)并能产生新事物(真理)的程序的命名,所以巴迪欧说“两的场景是一种劳作,是一个过程。在假设有两的前提下,它仅以轨迹的形式存在于环境之中。两是对劳作或者轨迹展开意外调查的假设性算符”(263)。至此,我们可以就“爱是什么”的问题,给出一个简明的回答:爱是绝对的分离,是两的场景,是基于差异的创造,是向差异的普遍性共存的演进。

如果要把握“爱是两的场景”的理论意义,则还需要一个比较视角,因为这一定义至少挑战了三种爱的主流观点。第一种是“爱是融合”。这个观点在浪漫主义的艺术与哲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恋人们为了摆脱世俗的束缚,在炽热爱情的引导下,实现生命的融合。如同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and Isolde*)中“爱的誓言”:

我们就一起死，
为了不分开。
永远联在一起，
地久天长，
永远不醒，
永无恐惧。
相拥一起
无名的欢愉，
我们活着，
只是为了爱！（瓦格纳 610）

爱是融合，意味着在两性之间创造了“一”的神圣符号，一切差异都在其中消解，变得无关紧要。

第二种是“爱是奉献”。其核心是“他者”的概念。爱被理解为一种“自我”朝向“他者”的运动，意味着自我中心的逻辑被他者中心的逻辑所取代。如黑格尔所言：

这种把自己的意识消失在另一个人身上的情况，这种忘我无私的精神（只有凭这种精神，主体才会重新发见他自己，才真正实现他的自我），这种忘我的精神（由于忘我，爱情的主体不是为自己而存在和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操心，而是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自己存在的根源，同时也只有在这另一个人身上才能完全享受他自己）就形成爱情的无限性。（黑格尔 327）

这种自我意识消融在他者中，并在他者身上重新确认自身价值的过程，就是奉献之爱的观点。

第三种是“爱是虚幻”。这是一种宗教与道德主义的说辞：男女之爱都是由欲望（罪）所激发的短暂幻觉。不过还有一个世俗版本，即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著名论断：爱不过是对“性关系不存在”的补偿。巴迪欧进行了解释：

拉康向我们指出，在性爱中，每个个体基本上只是在与自己打交道。当然，这其中会有他人身体的介入，但最终仍然是自己的享乐。性并不使人成双成对，而是使之分离。当您赤身裸体与他（她）贴身相对，这其实只是一种图像，

一种想像的表象。实在，却只是快感把您带向远处，远离他人。实在是自恋式的，其关系是想像的。（《爱的多重奏》49—50）

爱作为对性关系不存在的补偿，实际上是爱制造了“性关系真实存在”的假象。恋人们自认为爱着对方，却是一种自恋，对方只是自我欲望的投射对象。

巴迪欧关于“爱是两的场景”的论断是从对上述三种观点的否定中引申出来的，其内涵具有鲜明的新唯物主义性质。首先，他以绝对分离的性别立场作为爱的前提，否定了爱是融合的观点，以平凡的“多”（两）否定了神圣的“一”。其次，保留了“他者”在爱情中的重要位置，但否定了“他者”的至上性，强调自我与他者在爱的运动中的平等地位，两者在一种不可化约的“两的结构”下实现生命的创造。最后，否定爱是虚幻的观点。通过重释拉康的理论，认为“爱是对性关系不存在的补偿”是真实的，且具有本体论的意义。爱是对存在本身的增补，能够以差异性为基础，生产出全新的普遍性事物。

由此看来，“爱是两的场景”的内涵颇为复杂，需要结合巴迪欧的基本哲学思想进行评断。第一，关于“多的本体论”命题，存在是“多”，不是“一”。所以爱的前提是差异，而不是同一。巴迪欧坚持爱的数字性是“两”，因为“两”是一种独特的差异性结构，不能被还原为“一加一”，也不能被纳入计数规则。第二，事件（偶然性）概念占据中心位置。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两”的结构性出场是无法预料的，是偶然性的产物，如同伊壁鸠鲁学派所说的从天空下落的原子雨，因“偏斜”（clinamen）而在半空中碰撞结合并形成世界万物（伊壁鸠鲁 卢克莱修 89—90）。爱情始于男人与女人的相遇事件，相遇本身不可预测，其后果也无法估量。第三，真理产生于主体对事件的忠诚过程。如果要维持“两的结构”，需要爱人们忠诚相守，即围绕相遇事件而展开行动，包括对事件的命名、宣告以及不断回溯更新其意义。这种持续的双向的主体运动，会将事件的偶然性内涵提升至必然性与普遍性层面，从而形成爱的真理。第四，真理的诞生会冲击世界的固有法则。爱的真理是爱人们基于差异性与偶然性创造出的全新的

普遍性,会滋生出参与构建新世界的真切体验:“透过我们之间的差异性,世界朝我们展开,世界来临、世界诞生,而不再只是填满我的视线。于是,爱一直是一种可能性,一种参与到世界之诞生的可能性。”(巴迪欧,《爱的多重奏》55)爱的真理潜在地指向一个新世界,对旧世界的法则及其实存逻辑构成了挑战。综上所述,“爱是两的场景”不仅奠基于“多”“差异”“偶然性”“过程性”等本体论概念,而且还在现象论层面涉及真理的主体性实践、世界逻辑的变革等问题,无一不彰显出巴迪欧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立场,同时也显露出其以理论改变世界的雄心:以起源于偶然性的爱的真理为引线,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编织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从而推动世界实在的整体变革。

二、艺术的抉择:创造爱的延续性图景

巴迪欧赋予了事件(偶然性)概念在爱情中的奠基性作用,但并未将爱等同于纯粹的“相遇”,而是认为爱在本质上是一种持续性的建构,即主体围绕事件进行真理生产的过程。对此,哲学应该关注一下艺术说了些什么。因为相比哲学的抽象命题,艺术对爱的思考更为多元,对情感经验的表达更为丰富和具体。一些反哲学的思想者甚至认为爱情是理论无法解释的,爱在实存层面的真理只能被艺术所捕捉。巴迪欧深知哲学在爱的问题上所能抵达的极限,若要深入探究爱的相遇与延续的主题,他建议我们求助于艺术(Badiou, *L'immanence des vérités: l'être et l'événement*, 3 614)。

爱情都有一个开端,我们称之为爱的“相遇”。艺术家特别钟意爱的相遇主题,创造了无数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画面。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就开始于一个毫无征兆的、超乎意料的“一见钟情”。“一见钟情”既预示主人公爱情悲剧的发生,又蕴含着他们的爱情将打破死亡之有限性而重获新生的力量。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说:

《罗密欧与朱丽叶》总能轻易博得年轻人的厚爱。它莫名地传达着爱的本质,告诉我们爱应当是什么:一种永恒的可能,每个新生希望的实现,一件令

人敬慕之物。[……]一见钟情轻叩着人们最丰沛的情感,让两个人的全部能量都倾注在彼此身上,发掘出彼此最好的品质,压制住卑微而丑陋的欲念。一见钟情似乎毫无疑问就是好的,并且总是可能的。这是上天的旨意(natural imperative)。(《爱的戏剧:莎士比亚与自然》4)

布鲁姆欣赏莎士比亚式的“一见钟情”,因为其中包含美德与理性的品质。但对浪漫派笔下的“爱情邂逅”则嗤之以鼻,因为浪漫派偏爱激情,只有欲念,缺乏爱欲。巴迪欧对浪漫主义的极端爱情观同样持否定态度,认为浪漫派沉迷于“相遇”所带来的狂喜而无法自拔(《爱的多重奏》62)。这种浪漫的爱在相遇中开始,也在相遇中消亡。

现时代的爱情叙事远比过去的浪漫派更迷恋相遇。在当下的通俗艺术中,最符合大众审美期待的爱情叙事总是围绕“相遇时刻”而展开。最典型的模式便是,两个陌生男女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之中,互不相识,依循各自的生活轨道而活动。某一天,意外发生了,两人相遇、相识并相爱,爱的幸福感达到顶点。但好景不长,各种原因迫使他们不得不分开。这时故事的发展会有几种选择,要么恋人们克服万难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当代爱情的喜剧;要么恋人为爱而牺牲,谱写一曲爱的悲歌,这是当代爱情的悲剧;此外还有一种现实剧的设计,恋人们在艰难挣扎之后,最终选择向现实妥协,与不爱的人组建家庭,最后他们会有一个再次不期而遇的时刻,用来表达对爱情的无奈叹息。为什么说这些故事的核心都是相遇呢?因为在故事中,相遇就是爱的巅峰体验,爱的激情及其全部可能性在其中被耗尽,故事的后续发展要么是加强最初的基于相遇的爱的体验,要么就是相遇的体验不可阻挡地走向衰退,直至爱情本身消失不见。

要真正把握爱的本质,就不能把爱简化为相遇,因为爱是一种持续性建构,这是巴迪欧“爱是两的场景”最为核心的内涵。两个人相遇并相爱,这只是故事的开始,如何将爱情延续下去才是故事的主干。但现时代对爱的延续普遍持怀疑态度,浪漫主义的精神残余与消费主义的商业伎俩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卢梭,这位浪漫主义的

精神之父,在其文学创作中始终对爱的永恒性保持怀疑。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卢梭在《新爱洛伊丝》(*The New Heloise*)中,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没有人会觉得最初相爱相依而后来形同陌路是一种耻辱’。言外之意便是:对爱情的永恒承诺都是假的,昔日如梁间燕子般成双入对,如今也可以互相厌恶到憎恨,到头一场空,爱情什么都不是。”(朗瑟兰 勒莫尼耶 99)一个并不相信永恒爱情的哲人,依然能写出动人的爱情小说,似乎有些荒谬,但如果熟悉今日的爱情叙事,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合理性”的。商业或消费主义时代最受欢迎的爱情故事并不强调爱应当延续下去,应当走向永恒,相反,大众媒体都在鼓吹“爱的保质期”,如同商品一般。任何爱情都是有期限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坦然接受这一现实。不要因为这段爱情的结束而感到沮丧,应该迅速寻找并开始下一段爱情,这是现代社会所独有的自由与浪漫。交友网站以陌生的“邂逅”为刺激性卖点,婚恋网站宣称爱情的发生将变得安全与可控,大众影视对男女如何迅速相爱进行示范性表演,这一切都将高贵的爱欲降格为低劣的欲望。一切都是与性相关的文化,一切都指向了这背后可观的商业价值,唯有爱欲消失了。

因现代社会爱欲的消失而感到不安的人们在努力寻找使之延续下去的方式。恋人们的不安感最为强烈,他们延续爱的方式也最为激进与大胆,但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制造了爱的延续的假象,最终依然被束缚在欲望的循环往复之中。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短篇小说《搭车游戏》(*The Hitchhiking Game*)很好地揭示了这一点。小说讲述了一个通过不断制造“相遇”来维持爱欲的故事。年轻的恋人对他们的爱情感到莫名的焦虑,在一次偶然机会中,他们玩起了“搭车游戏”——一种角色扮演的游戏,汽车司机与搭车女郎在公路上邂逅并以言语相互挑逗情欲的游戏。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个新鲜又刺激的游戏似乎激活了爱欲,两人原本变得乏味的情感关系突然出现了转机,于是乐此不疲,深陷其中。然而“搭车游戏”只是制造了爱的持续性的假象,因为游戏挑起的不是恋人间那朝向永恒的爱欲,而是不断变幻的欲念。当欲望成为游戏的主导,相遇已不再是复苏爱欲的方式,而是一种唤起性欲的暗示。当代世界的爱情的普遍命运正是:爱欲被不

断膨胀的欲望所吞没,从而导致爱情关系的彻底瓦解。

那么恢复爱欲的方式应该是什么呢?或者说如何能够让爱欲始终持存,将爱情本身推向永恒?巴迪欧从哲学上进行了回答:基于“两”的主体性结构而不断地劳作。延续爱的方式必然是以“两”的主体性结构为基础,如同一支“自我”与“他者”的“双人舞”,在独立、平等与协作的关系中共同绘制爱情的发展轨迹。这与欲望的结构不同。在欲望之中,自我似乎也是朝向他者,渴望他者,但实质上是以他人为媒介而满足自身,其结构是孤立的“一”,没有为真正的“他者”留下位置。“他者的存在”是必要的,是区分爱欲与欲望的重要标志。但是巴迪欧也指出了另一种爱的危机——一个令“自我”消失的“绝对他者”同样会破坏“两”的主体性结构,使爱的持续性建构变得不可能。韩炳哲(Byung-Chul Han)非常推崇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将他者的绝对性作为激活爱欲的前提,并且张扬黑格尔式的爱情观:“‘爱情的本质’在于牺牲自我意识,将自我置于他者之中而导致忘我。”(韩炳哲 43)巴迪欧对此提出了质疑:

一个人真的只能通过难以企及的,甚至是庄严的“自我牺牲”来对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才能抵达“他者”的世界吗? [……]或许以满足他者利益为目的的自我牺牲,只是对于爱的“否定性”的一种暂时性的、极端的验证试验(Bewährungsprobe)。从形而上的角度看,这种没有边界的、对他者和“否定性”的绝对接受不也是一种“极左”的思想吗?(巴迪欧,《序:重塑爱欲》8—9)

巴迪欧否定了将“绝对他者”作为爱之本质的设定,而始终坚持将爱的过程视为“两”的主体性结构的不断运转。这是让爱延续下去,通向永恒的唯一方式。

从哲学上对爱的延续进行探讨是有限的,因为哲学无法弥补我们在这个主题上的贫乏经验。要想获知爱的延续更丰富的现实情态,需要求助于艺术在创造全新经验上的非凡能力。不过,对艺术而言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巴迪欧认为我

们的文学作品喜好表现某种不可能的爱情,比如爱的分别、爱的牺牲、爱的消逝等,却较少关注爱的延续。当然我们会说还有许多以婚姻为题材的作品,但婚姻并不总是爱的延续。毕竟艺术家们很早就明白了反抗婚姻的爱情故事会更具吸引力。这里说的“延续”,不是指恋人们一直相爱,一直生活在一起,而是指爱在共同的生命中永不停息的创造活动。所以真正表达爱的延续主题的作品并不常见,在现时代则更为稀有,因为受到了日趋分裂的世界现实的制约。巴迪欧称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是我们时代少有的以爱之延续为创作主题的伟大作家,他的理由或许正在于后者在创作姿态上的反世界性或反日常性。因为贝克特总是在无人注目的生活暗角寻找能使爱情延续下去的力量。贝克特有两个文本《美好时日》(*Happy Days*)和《够了》(*Enough*),均以老年夫妻的困难生活为故事内容。在他平静的叙事下,老人们的困苦生活呈现出爱的持续性力量。如同《美好时日》中老人的独白:那曾是多么美好的日子呀!巴迪欧表示:“她这么说,因为爱一直在那里。爱就是这样一种坚强有力、始终不变的因素,变成为我们生命的内在结构,虽然表面看来生活糟糕无比。”(《爱的多重奏》112)爱正是对抗生活之沉沦与身体之疲敝的潜在力量。

在贝克特的另一文本《克拉普最后的录音带》(*Krapp's Last Tape*)中,巴迪欧显然找到了艺术坚持以爱的延续为主题的创作理由:爱的延续所产生的力量会在爱的主体之间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主人公在弥留之际,听着记录了自己每个人生阶段的录音带,回到了爱情开启存在之无限性的时刻。让我们直接引用其中的一段描写以及巴迪欧的评论:

湖泊上游,远离河岸,坐小船而下,入水漂流。她舒展身体躺在船底,双手枕着脑袋,闭上眼睛。阳光灿烂,微风徐徐,流水潺潺。我瞧见她的大腿上有一道疤痕问她是怎么弄的。采醋栗,她说。我又说我认为这是没希望的,如此下去没有任何好处,她表示赞同,没有睁开眼睛。我叫她看着我,片刻之后——片刻之后她这样做了,但只是眯着眼,因为阳光刺眼。我俯身投下阴影,眼睛就睁开

了。让我行驶开来。我们在芦苇间漂流,小船陷入其中。弯下身来,在船首前叹息。我躺下去把脸埋在她的胸口把手放在她的身上。我们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但我们身下的一切都在移动,推动我们,温柔地,起伏,荡漾。

午夜之后。如此寂静,无人可知。

——如你所见,这是绝对时刻的多元在水面上展开的诗歌,爱情中的恋人,甚至是在爱的尽头,也暗示着感知的无限性。(Badiou, *Conditions* 359—360)

贝克特笔下无比倔强的爱情,正是对抗身体衰弱、欲望消失、生命终结的力量,在其独有的诗学效果之中,我们窥见了由爱所开启的新世界的景象。这并不是是一种审美幻觉,而是激发了爱人们对永恒的强烈的体验,使他们相信对爱情的坚持,最终会促成一个最小世界的诞生,只有在这个“两”的世界中,他们才能存在,才能幸福。由爱所开启的世界必定与现世界形成一种对立,在爱欲的持续引导下,主体会萌生变革世界的冲动。如此看来,爱的延续的重要性会从哲学和艺术延伸至政治实践领域,而我们时代的艺术家也要面临一项抉择:是继续停留在浪漫主义的相遇神话中,还是去探索爱的延续的现实难题,这关系到是选择继续顺从,还是选择变革世界的生存逻辑的问题。

三、世界的重建:爱与艺术的“新唯物主义同盟”

爱情始于一次无法预料的相遇,同时在爱之中,又有某种普遍的、永恒的东西,这与开端处的纯粹偶然性并不相容。为此需要把爱视为一个持续建构的过程:爱的主体从偶然性出发,通过艰辛但又快乐的劳作,向爱的真理的普遍性演进。所以爱的真理是过程性的,与主体活动紧密相关,并且总能在现有世界的内部创造出某种关于新世界的经验。这是一幅非中心化的、以差异之交融为底色的世界图景,唯有借助艺术的精妙表达才能领会:

好比,在山村中,某个宁静的傍晚,把手轻搭在爱人肩上,看夕阳西下即将

隐入远处的山峦,树影婆娑,草地宛如镀金,归圈的牛羊成群结队;我知道我的爱人亦在静观这一切,静观同一个世界,要知道这一点,无需看她的脸,无需言语,因为此时此地,两人都已融入同一世界之中。当此际,爱就是这种悖论,这种同一的差异性和差异的同一性;当此际,爱存在着。(巴迪欧,《爱的多重奏》55)

爱的经验包含着创造新世界的经验,所以巴迪欧说现时代最根本的任务是创造一种全新的爱,这意味着追寻一种新的现代性,重建一个新世界(“Love, the Revolution — and Alain Badiou.” 215)。正是在这个目标上,爱与艺术结成了唯物主义的同盟,并开启了与政治解放活动结合的可能性。

以“创造爱的方式来重建世界”的想法最初源于卢梭的一项计划。根据布鲁姆的说法,卢梭提供了一套“爱的设计”方案,以重新创造“爱欲”的方式来修补世界无可避免的分裂:

他是爱的现代阐述者与倡导者,他发起了一场爱的运动——浪漫主义运动。这场伟大的运动立志要在孤立的布尔乔亚社会中为人的联合提供一个新基础。它的爱情观试图将最纯洁的渴望与最完满的肉体满足结合到一起。它试图将性从基督教的原罪当中拯救出来,并在保证了从柏拉图对爱与友谊的理解中消失的互惠性之后,恢复柏拉图式爱欲(Platonic eros)的灵与肉的结合。它通过存在于极端不同因而完全互补的男女之间的“爱的理型”做到了这一点,而这个理型是由新近才被正当化的性冲动以及一种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的想象力所建构起来的。(布鲁姆,《爱的设计:卢梭与浪漫派》27)

令卢梭忧心忡忡的是日益临近的布尔乔亚社会。这种社会的本质与原初的自然状态相近:人们为求自保而相互竞争,既自私自利又虚荣傲慢,个体之间除了冰冷的契约关系,无法实现真正的联合。因此社会在其构成上就是分裂的,“自我”与“他

人”的敌对关系无法彻底消除。卢梭为了克服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想在一个认为没有爱欲的自然,或者缺乏爱欲的布尔乔亚社会中,重新创造人的爱欲,从而实现原子化的、相互敌对的个体的联合。但事实证明,卢梭及其浪漫主义的后继者在创造爱欲的方案上是失败的,因为他们过分依赖想象力所激发的狂喜,构建了爱与艺术的乌托邦,却把残酷真相留给了现实世界。

卢梭和康德建造的精致结构倒塌了,不管是为了连接自然与社会这两极、弥合分裂的人,还是为了在文化中找到第三条道路,比之前任何一条都要高尚的路。浪漫主义所营造的所有狂喜都破灭和陨落了。高的东西开始显得只是道德说教,而低的东西看起来倒成了真正重要、过去一直被浪漫主义遮蔽的东西。(《爱的设计:卢梭与浪漫派》296)

浪漫主义关于爱的崇高理想在现时代彻底堕落,爱欲没有被成功创造,“性欲”则成了建构爱情关系仅有的中心,这只会加剧自我与他者的分裂。最终,在卢梭通过创造爱欲来弥合社会之分裂的计划落空后,浪漫主义“重建”世界的“爱欲政治”也就只是一厢情愿了。

尽管如此,卢梭依然为人们留下了可贵的思想遗产。在重新思考爱、艺术与世界的关系上,巴迪欧从卢梭及其门徒那里至少学到了两个东西:其一,延续“以创造爱欲来重建世界”的计划,只不过是以更激进的方式,将爱欲“修正”世界的逻辑导向“革命”政治的逻辑。其二,看重艺术或艺术家在这个计划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卢梭本人通常是以作家而非哲学家的身份来探讨爱欲问题的。因为探讨爱欲问题,需要一种对灵魂进行深入观察的“心理学”,小说家或诗人是最佳人选,因为“他是一个技艺娴熟的人类观察者,他不必先向任何一种理论低头”(《爱的设计:卢梭与浪漫派》295)。巴迪欧同样认可艺术的这种优先权,哪怕是哲学也要通过艺术的桥梁来思考爱的本质,比如他经常借助兰波(Arthur Rimbaud)、布勒东(André Breton)、贝克特等作家的文本来探讨爱的哲学。除了注意到巴迪欧对浪漫主义爱情思想的某种继承,我们还发现他正是在爱欲消失的

地方着手其工作。在保守主义者眼中,现代社会爱欲的消失要归咎于启蒙运动。这场运动带给了后世两个全新的事物:“科学”的唯物主义和“平等”的激进主义。前者以科学的名义将“爱欲”还原为“性”,并纳入“性学”范畴;后者消解了爱欲的对象本应有的价值等级,忘记了爱欲总是从“偏好”开始的(布鲁姆,《爱的设计:卢梭与浪漫派》3—4)。巴迪欧重建爱欲的出发点正是“唯物主义”与“平等主义”,尽管这两个术语已被他赋予了全新内涵——比如“偶然”的唯物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平等主义,但也能表明他是在肯定启蒙运动的前提下,从一个不同的现代性视角,重新思考爱、艺术与世界的关联。这是一位与保守主义路线完全不同的左翼思想者的计划。

可以把巴迪欧的计划概括为如下问题:爱与艺术以何种方式结合,才能具有重建世界的意义?或者说,艺术如何以爱为主题生产出全新的经验,从而开启一个新世界?巴迪欧为之提供了全新的回答:借助“偶然”的力量。艺术中处理“偶然”的方式是多样化的,某些艺术家则尝试表现隐藏在“偶然”之下的巨大能量。巴迪欧盛赞日本导演沟口健二(Kenji Mizoguchi)的电影《近松物语》(*The Crucified Lovers*),认为该作品表现了偶然的爱情对日常生活之必然性的挑战(“Thinking the Event.” 5—6)。电影讲述了一个“婚外恋”的故事:一个年轻女人嫁给了一个小作坊主,后来与一个青年佣工相爱。两人为躲避“私通”的罪行而逃亡,但最终被捕,并被游街处刑。电影结局表面上看是必然性法则(世俗律法)取得了胜利,相爱之人被游街示众,等待他们的是死亡。然而,在影片最后一幕,他们脸上流露出了明朗的“微笑”,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审美时刻,因为人们能够确认真正的胜利者是他们那不期而遇的爱情。电影带给了观众关于爱与世界的新经验:爱情作为一种起源于偶然性的力量,在其朝向永恒的运动中,会构成对世界实存法则的否定,并以此建立与新世界的联系。因为要让这种不为世俗律法所容忍的爱情延续下去,只有在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才是可能的。在此意义上,唤起人们对新世界的热情与想象,成了爱与艺术的同盟所致力的目标。

作为一种补充,我们需要提及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的短篇小说《未知

岛传说》(*The Tale of the Unknown Island*),小说展示了另一种借助偶然性的力量来创造爱欲及开启新世界的方式。《未知岛传说》讲述了一则爱情的传奇寓言。一个男人敲响了王国的“请愿之门”,请求国王赐予他一艘船去寻找那传说中的未知岛。人们都在嘲笑他,所有的岛都被标注在地图上,没有什么未知岛。国王最后还是给了他一艘船,但没有任何船员会跟随他出海,除了一个女人。她是王宫里的清洁工,已经受够了现在的生活,她决定跟随男人去寻找未知岛。男人与女人成了船上仅有的船员。他们在大海里航行,两人相知相爱,最后他们将船命名为“未知岛”。“未知岛”既是对新世界的隐喻,也是对他们爱情的命名。两者都是“未知的”,无法预料。两者又是相互促进的,寻找新世界的渴望让他们相爱,而他们必须让爱延续下去,才能维持这种渴望,也才能触及新世界的边缘。小说通过偶然性范畴来组织叙事:男人寻找未知物的欲望、国王意外地赐予帆船、与女人的邂逅、海上无明确方向的航行,以及作为新世界之象征的“未知岛”。小说同样也表达了这一重要观点:重新创造爱欲即是重新创造世界,两者拥有共同的主体性起源。

巴迪欧所设想的艺术家及爱人对待现实世界的态度,与阿尔都塞笔下“坐火车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是一致的(《论偶然唯物主义》120)。有两位哲学家各自乘坐火车。一位是唯心主义哲学家,由于他提前知道了火车的起点站和终点站,就对身边的事物漠不关心。在旅途中他并未有什么新收获。另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则不同,他并不知道火车的来去方向,看见一辆火车经过,就跟着跳上去。他对很多事物都一无所知,因此需要不断地与车厢中的人们交谈,了解各种具体情况,以便于自己作决定,然后在路途中的某个地方选择下车。那么两位哲学家在态度上的差别说明了什么?唯心主义哲学家自信早已掌握了真理,洞悉现实中的一切变化,那么他对现实的态度,就是观察并印证自己的所知所想,这是一个专注于认识世界的冷漠主体。唯物主义哲学家认为自己一无所知,对世界保持着最大的热情与好奇,渴望在这个无限的实在领域与一切陌生的事物相遇,去知晓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所不知道的东西。由于他积极与世间万物“相遇”,其“自我”成长为强健有力的主体,从而具备了改造世界的能力。阿尔都

塞把这样的主体叫作“偶然的唯物主义者”(aleatory materialist)(*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 1978-87. 291)。巴迪欧推进了这一立场,他认为不仅哲学家应该秉持与世界相遇的态度,艺术家、爱人、政治行动者甚至科学家都应当如此,因为一旦抓住了世界中那些特别的偶然之物,也就抓住了真理之生成的可能性,这是后续的主体行动能够变革世界现实的前提。如果各主体在目标上有共同性,那么结成一种新的反抗者联盟就变得可能了。

对巴迪欧来说,共同的目标是存在的,比如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统治,但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反抗者联盟持存并最终达成其目标。爱与艺术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爱可以为政治目标的合理性提供证明。巴迪欧说爱是“最低的共产主义”(the minimal communism),“因为爱情中有一些东西不仅仅是一个人所经历的世界,而是由两个人共同看到的世界;在创造这种最小社群时——一个由两人构成的社群”(“Love, the Revolution-and Alain Badiou” 215)。爱对“两”的世界的构建为共产主义群体政治的可能性提供了最低限度的证明。第二,爱在政治群体内部发挥组织与协调功能。巴迪欧曾表示对于如何改变世界的问题,会涉及三个具体环节:策略、运动与组织,其中组织作为策略和运动的中介则尤为重要(“Love, the Revolution-and Alain Badiou” 217—218)。他在后续对孔德的研究中,明确指出爱是解决组织问题的关键点。他认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在《实证主义概观》(*Discours sur l'ensemble du positivisme*)中提出了一项民主政治的设计:将知识分子、工人、女性群体联合成一个民众组织,该组织通过“调节权力”(pouvoir modérateur)对政府进行监管(*L'immanence des vérités: l'être et l'événement*, 3 627)。知识分子代表制定策略的理智力,工人代表推进运动的行动力,女性则代表协调整智与行动之间的情爱的力量,以此才能确保政治行动向目标有序推进。第三,爱对各类主体的激发与塑造。巴迪欧谈到了孔德和克洛蒂尔德(Clotilde de Vaux)之间的爱情对前者写作《实证政治体系》(*Système de politique positive*)的激励性作用(*L'immanence des vérités: l'être et l'événement*, 3 633)。但爱的激发对象并不限于哲学家,在艺术家和政治行动者身上有更

明显的效应,艺术家从爱情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普通人亦会因为爱情而奋起反抗世界的不公,成为激进的政治斗士。总之,爱会成为反抗者联盟改造世界的动力引擎。第四,艺术的作用体现为对爱与政治之激情的引导和升华,从而确保联盟组织的稳定、团结与友爱。爱与政治共同拥有追寻真实,创造新事物以及重建世界的激情。只要爱与政治还未在现实世界达成其目标,它们就必定会在艺术中携手前行,从艺术所构造的世界图景中获取坚持不懈的力量。因为艺术总是试图在不可能性之中发现可能性,在事物未完成之际提前宣告其最终的来临。

结 语

巴迪欧以重建世界为目标,构造了一种爱与艺术的同盟,尽管其中有很强烈的现实意图,但必须承认其诗学意义远大于政治实践的意义。作为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代表人物,巴迪欧不仅试图从理论上找到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的正当性和可能性,还尝试将其贯彻到现实的政治运动中,但他依然未能跨越两者之间的鸿沟。他的哲学为四种不同的真理程序(科学、艺术、政治与爱)提供了形式上共存的可能性,却不能统合四种创造性活动在现实世界中的分裂。比如,艺术与爱情能够以偶然事件为开端,但科学与政治却未必如此。将科学发现与政治解放寄托于曾经发生或者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件”是颇为荒诞的;个体试图忠诚于难以辨识的事件并展开行动而成为真理的“主体”,也很有可能是一种幻象,因为此时真理还无法被验证,只能被个体所确认(“我认其为真”),而主体(认为自己已掌握真理的个体)很可能是愚蠢的。科学与政治活动如果要取得进展,需要更多的理智感和现实感,偶然性范畴无法在其中占据主导。如果主要以“事件”“例外”或“危机”等因素来构建政治方案,有将“政治行动”转变为“作诗”的危险。这种政治的浪漫化大抵是当代西方激进理论的通病,受到了多方批评。所以,巴迪欧就爱与艺术的关系所进行的思考,我们更应该关注其中的诗学价值,特别是偶然性范畴对于艺术创作与批评的重要意义。从偶然性范畴出发,艺术的物质性、艺术主体、艺术真理等概念会被赋予全新的内涵,从而为一种新唯

物主义诗学理论奠定基础。也正是巴迪欧在本体论和现象论两个层面保留了艺术真理的位置,使得他的诗学与当代新唯物主义主流有很大不同。后者常以“身体”和“语言”为其理论焦点,取消了“真理”的位置,巴迪欧称其为“民主唯物主义”(matérialisme démocratique)(*Logiques des mondes: l'être et l'événement*, 2 13)。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 Žižek)将当前各种新唯物主义理论都纳入这个名称之下,对其唯物主义的真实性质进行了质疑,但他和巴迪欧亦有很大分歧,并且同样受到了其他唯物主义者批评(Johnston 12—14)。这种新唯物主义阵营内部的论争势必会持续较长时间,对当代文化理论会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我们给予更多关注。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路易·阿尔都塞:《论偶然唯物主义》,吴志峰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49.4(2017):116—124。
- [Althusser, Louis. “On Aleatory Materialism.” Trans. Wu Zhifeng. *Marxism & Reality* 149.4(2017): 116—124.]
- . *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 1978—87*. Trans. G. M. Goshgaria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6.
- Badiou, Alain. *Conditions*. Paris: Seuil, 1992.
- 阿兰·巴迪欧:《序:重塑爱欲》,宋斌译。韩炳哲:《爱欲之死》。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9。
- [———. “Foreword: Reinventing Eros.” Trans. Song Song. *The Agony of Eros*. By Byung-Chul Han. Beijing: CITIC Publishing Group, 2021.1—9.]
- .《爱的多重奏》,邓刚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 [———. *In Praise of Love*. Trans. Deng Gang.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2.]
- Badiou, Alain. “Can Change Be Thought?” *Badiou and Politics*. Trans. Bruno Bosteel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289—317.
- . *L'immanence des vérités: l'être et l'événement*, 3. Paris: Fayard, 2018.
- . *Logiques des mondes: l'être et l'événement*, 2. Paris: Seuil, 2006.
- . “Love, the Revolution — and Alain Badiou.” *Badiou and His Interlocutors: Lectures, Interviews and Responses*. Eds. A. J. Bartlett and Justin Clemens. London:

- Bloomsbury, 2018.211—218.
- . “Thinking the Event.” *Philosophy in the Present*. Ed. Peter Engelman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1—48.
- 阿兰·布鲁姆:《爱的戏剧:莎士比亚与自然》,马涛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年。
- [Bloom, Allan. *The Drama of Love: Shakespeare and Nature*. Trans. Ma Taohong.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19.]
- .《爱的设计:卢梭与浪漫派》,胡辛凯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年。
- [———. *The Project of Love: Rousseau and the Romantics*. Trans. Hu Xinkai.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18.]
- 伊壁鸠鲁 卢克来修:《自然与快乐:伊壁鸠鲁的哲学》,包利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 [Epicurus and Lucretius. *Nature and Pleasure: The Philosophy of Epicurus*. Trans. Bao Limin, et al.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20.]
- 韩炳哲:《爱欲之死》,宋斌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
- [Han, Byung-Chul. *The Agony of Eros*. Trans. Song Song. Beijing: CITIC Publishing Group, 2021.]
-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Aesthetics*. Vol.2. Trans. Zhu Guangqi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
- Johnston, Adrian. “Materialism without Materialism: Slavoj Žižek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Matter.” *Slavoj Žižek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Eds. Agon Hamza and Frank Rud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3—22.
- 奥德·朗瑟兰 玛丽·勒莫尼耶:《哲学家与爱:从苏格拉底到波伏娃》,郑万玲、陈雪乔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 [Lancelin, Aude, and Marie Lemonnier. *Philosophers and Love: From Socrates to Beauvoir*. Trans. Zheng Wanling and Chen Xueqiao.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21.]
- 理查德·瓦格纳:《瓦格纳戏剧全集》,高中甫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
- [Wagner, Richard. *The Complete Plays of Wagner*. Trans. Gao Zhongfu, et al. Beijing: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House, 1997.]

(责任编辑:王嘉军)